

嶗山誌叢

第二輯



崂山志丛

第二辑

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

一九八九年五月

责任编辑 崔立环

责任编辑 崔立环

前 言

崂山雄伟奇秀，历史悠久，素有“海上名山第一”的美誉。但因崂山地处一隅，古代典籍资料不多，加之“十年浩劫”，多有散佚，故《崂山志》的编纂，也就存在着一定的困难。为此，特创办《崂山志丛》。

编辑《崂山志丛》，将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，对《崂山志》的编写起到勾稽史籍、考订资料、丰富内容和拾遗补阙的重要作用。它既将广泛地汇集崂山的重要资料，又将博采众长，深入研究崂山的历史和讨论有关的某些关键性问题，还将刊登和转载有关崂山诸方面的学术论文及专著。

由是，恳望研究崂山的各方专家、学者和谙知崂山风貌的当地居民，多提供一些资料，多撰写一些考订文章，从而为编写一部观点正确、资料翔实、内容丰富、特点突出、文图并茂的社会主义新山志而贡献力量。

编 者

一九八九年五月

· 目 录 ·

前 言

* 百 鸣 园 *

- 墨子为齐国人再论…美国孔子文教基金会执行长 宋正介 (1)
《山海经》所载崂山之我见……………侯文程 (5)
于七师慈沾事不假……………曾 却 (9)

* 管 见 录 *

- 崂山历史上“僧道之争”浅析……………段孝先 (14)
《东坡仁里》石碑与苏东坡……………铁环 陈玄 (26)

* 五 彩 贝 *

- 从考古看崂山……………刘 朴 (28)
《册府元龟》与华严寺……………时桂山 (35)
崂山民间故事探源……………张崇纲 (38)

* 道 教 谈 *

- 崂山之道教……………戴国斌 (46)
崂山部分宫观寺院简介……………栾学智 (54)
崂山名道觅踪……………宗 传 (69)
西汉至明代崂山道教音乐考查记……………陈振涛 (76)

* 人 物 志 *

- 于乐吾其人其事.....曾君文 (89)
风尘奇道张三丰.....宋琴 丕珊 (103)
王葆崇与《崂山金石录》.....闻 诚 (111)

* 风 物 篇 *

- 崂山中草药资源概况.....孙 琪 (113)
明霞洞中药材种植试验场.....王新书 (118)
崂山仙胎鱼.....牟 军 (121)

* 拾 零 集 *

- 崂山兵事记略.....青岛警备区军志办 (124)
崂山山区建置始末.....栾兴钧 (135)
秦至清代崂山大事纪要.....牛 津 (138)
崂山著名佛教寺院.....宗 矫 (150)
崂山的峰涧山口.....张泽善 (176)

* 鉴 古 碑 *

- 邱长春崂山摩崖刻石遗迹.....王集钦 (186)
崂山古遗址考查.....刘 文 (199)

* 餐 紫 霞 *

- 游崂诗抄五首.....戴良等 (204)
崂山华严庵游记.....李中简 (207)

* 他 山 石 *

- 《黄山志》志稿选登..... (209)

墨子为齐国人再论

美国孔子文教基金会执行长 宋正介

我前写有《墨子为齐国人考》一文，刊在《大陆》杂志第十一卷八期。后来《大陆》杂志第十三卷十二期，载有李绍昆君《墨子非齐国人说》一文。李君对我的《墨子为齐国人考》所举的证据，一则曰“似不可靠”，再则曰“似乎太风马牛了”；一则曰“断章取义”，再则曰“凭空幻想”。否决了墨子为齐国人。考证历史，假设可如李君用“似乎”“风马牛”等作依据，则历史上的定论既可推翻，其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，则亦容易一一解决，殊不必有所谓“历史考证”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：李君既否认了墨子为齐国人，对于墨子之国籍问题应有自己之主张才对，但李君对于墨子为何国人，却只字未曾提及。夫胡怀琛氏主墨子为印度人，金祖同氏主墨子为阿拉伯人，其说虽谬，墨子尚有国籍可属，如李君所说，墨子岂不成为无国籍者？故李君之大作虽佳，弩钝如我，则无从领教。

我写本文的目的，非在答辩，是在根据新的证据，续考墨子为齐国人。我依旧相信墨子为齐国即墨大劳山人。现在分述之如下：

墨子为齐国人——《墨子·鲁问篇》：“子墨子见齐大王。”墨子周游列国，会见了多国的国王，独称齐田和为大王，是乃对自己国王之尊称也。《墨子·公输篇》：“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，成，将以攻宋，子墨子闻之，起于齐……子墨子归，过宋天雨……。”此乃墨子为齐国人之铁证。许多学者根据《吕氏春秋》谓“起于鲁”，随证墨子为鲁国人，并谓“起于齐”为误。然所谓“误”，从何而误？误于何人之手？根本毫无根据。《吕

《吕氏春秋》高诱序：“不韦为相国，号称仲父。不韦乃集儒书，使著其所闻，为十二纪、八览、六论、训解，各十余万言。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，名为《吕氏春秋》，暴之咸阳市门，悬千金其上，有能增损一字者，与千金。时人无能增损者，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，盖惮相国，畏其势耳。”《吕氏春秋》不是金科玉律，其中之错误，后人多有发现，学者不谓《吕氏春秋》“起于鲁”错，而说《墨子》本书“起于齐”误，岂不颠倒是非？试问《吕氏春秋》早于《墨子》，抑《墨子》早于《吕氏春秋》？假如说《墨子》早于《吕氏春秋》，而《吕氏春秋》未以《墨子》作根据，则错应在《吕氏春秋》，何以能说《墨子》错？

墨子姓墨齐国即墨人——千宝《搜神记》：“汉不其县，有孤竹城，孤竹君之国也。灵帝光和元年，西人见水中有浮棺，欲砍破之，棺中人语曰：吾伯夷之弟，孤竹君也。海水坏我棺椁，是以漂流，汝破我何为？人惧，因为立庙祠祀，民有欲发现者，皆无病而死。”姓考有云：“孤竹君本墨胎氏改为墨氏。”由此足证墨子为孤竹君的后代，江氏谓墨子非姓墨，愈显其荒谬不足道。不其原即墨旧地，汉改置不其县，其城故址犹存，距今即墨县治西南二十七里。《即墨县志》：“即墨县隋开皇十六年复立，并“并废不其入焉。”或谓以上乃是神话，不足采信。其实我们的古代史即未曾离开神话。此不独中国然，世界上各民族的早期历史，亦莫不如此。

墨子为即墨大劳山人——《墨子·备梯篇》：“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，子墨子甚哀之，乃管酒块脯寄于太山。”太山即即墨境之大劳山，学者将太山误解为泰山，遂证墨子为鲁国人，实未加细考。《兼爱》中：“子墨子言，是非其譬也，夫挈太山，而越河济，可谓毕劫有力矣。”又“传曰，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。”在同一章书内，泰山与太山泾渭分明。果太山即泰山，当不至于分的如此清楚。还有两千余年前的泰山，尚有猛虎在侧（《礼记·檀弓篇》），不适于人居住。有季氏旅于泰山（《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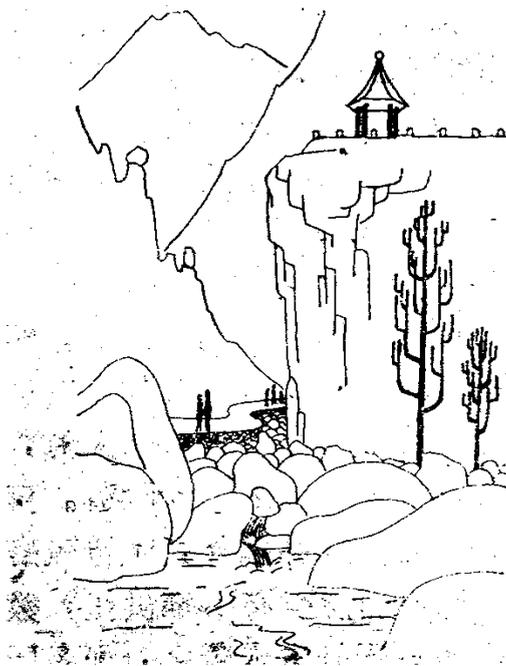
语·八佾》)未曾闻有寄于泰山者。相反地，劳山在此时已成为“神仙之宅，灵异之府。”秦始皇不远千里跋涉，登劳山望蓬莱（顾炎武《劳山考》），证明了当时劳山的神仙化。墨子尊天事鬼，劳山正是他的所在。陶弘景《真诰·稽神枢篇》：“墨狄子服金丹而告终。”葛洪说墨子为地仙，实在说明了墨子未离开一个神仙化的环境。《非攻·中篇》：“古者，吴阖闾教七年，奉甲执兵，奔三百里而舍焉，次注林，出于冥隘之径，战于柏举，中楚国，而朝宋及鲁。至夫差之身，比而攻齐，舍于汶上，战于艾陵，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。”学者把此处的大山亦解释为泰山，更是不近情理。齐吴两国在交战，交战的地点——艾陵又属齐国。吴国战胜了齐国，尽可占有齐国之全境，鲁国既未参战，当然不是战败国之一，吴国虽强，焉能干涉到泰山去？传吴王夫差在劳山得有灵宝度人经（见《度人经》序），窃以为得灵宝度人经不一定是事实，然其攻齐，由海路北上（《春秋传》），经过劳山，理有当然。当时吴军可能在大劳山岸登陆，以大劳山作根据地，渐次向北攻击，与齐军会于艾陵，战胜了齐国，保住了根据地——大劳山，墨子始有“葆之大山”之说。故可说大山者太山也，太山者，大劳山也。

劳山一词，在秦以前，尚不见于史书，顾炎武《劳山志》序：“劳山在今即墨县东南海上，距城四十五里，或八九十里，有大劳小劳……夫劳山皆乱石峭岩，下临大海，逼灰难度，其险处土人犹罕至焉，秦皇登之，是必万人除道，百官扈从，千人拥挽，而后上也。五谷不生，环林以外，土皆疏瘠，海滨斥卤，仅有鱼蛤，亦须其时，秦始皇登之，必一郡供张，数县储侍，四民废业，千里驿骚，而后上也。于是齐人苦之，而名曰劳山也。”由此考之，今之大劳小劳，在秦以前为大山小山，于秦皇游后，始加劳字于其上，随有今日大劳山小劳山之名也。

墨子所使用器具中有玳瑁（《太平御览》墨子篇），此物产于海中，非泰山所能有，劳山滨海，正是产此物的所在。

始我知墨子、即墨、墨水河（发源劳山）三者互为有因果，但未敢遽作断语，今可下一一定论：“即墨因墨水河而名（《即墨县志》），墨水河又因墨子而名。”张家庄因张三而名，李家寨因李四而名，墨水河之得名，亦如是同。

综合以上，太山之为大劳山，证据昭昭，墨子之为齐国人，更铁案如山。墨子之国籍问题，自史迁而后，聚讼不休，盖亦有时矣。余今为之证误，不独墨子得其所在，且劳山亦得脱颖而出。所谓“人杰地灵”，良非虚言。



《山海经》所载崂山之我见

侯文程

《山海经》中记有崂山之说，尝散见于近几年记述崂山的文章、游记中。究其根源有二：其一，是因名噪一时的学者顾炎武在其《日知录·劳山考》中，曾提到“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亦有劳山”；其二，是因清代训诂学家郝懿行在其《山海经笺疏》中，曾望文生义的作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注疏。本文想就此略陈己见，以示读者。

《山海经》是一部古代地理著作，共十八篇。《山海经》之名始见于《史记·大宛传》，在刘歆《山海经叙录》和王充《论衡》中，皆认为是禹、益所作。今人考据则认为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，其中十四篇作于战国时期，四篇作于西汉初年。书中共记载了五千三百多个山名，二百五十多个水名和一百七十多种植物名称，古代的许多神话故事也幸赖是书得以保存崖略。记载这样多的山名，已容易引起崂山必囊括在内的错觉，更何况顾炎武又结结实实地加上了“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亦有劳山”之言；嗣后，清代学者郝懿行，又为“琅邪（琊）台……其北有山，一曰在海间”之句加了一个“其东北有山，盖劳山也”的注解。由是，崂山之名始于战国和西汉初期之说，得以夤缘附会而流传于世。

欲弄清这些问题，还必须从《山海经》中找答案。

在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中，对劳山作了如下表述：“西次四经之首曰阴山……北五十里曰劳山，多茈草，弱水出焉，而西流注入洛。”看来，只要能找出阴山、弱水和洛河的位置，便可识此劳山的真面目了。

说起阴山，会使人自然想到王昌龄《出塞曲》中“不教胡马度阴山”的诗句，但诗中所说的阴山，是今河套以北、大漠以南诸山的统称。无独有偶，在一些古代地理书中，确记载过即墨县有劳山和阴山。如宋代地理书《太平寰宇记》中的记述就是一例，该书提及即墨县境内有劳山和阴山，并把阴山与秦始皇联系在一起，书中记道：“古老相传云：秦始皇幸琅琊，因至劳盛山望蓬莱，……遣石人驱劳山不得。”清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，则进一步注明了劳山与阴山的位置：“劳山在县东南六十里……阴山在县东南八十里，俗传秦始皇幸琅琊尝驻于此……。”由此看来，阴山和劳山仅相距二十里，与《山海经》中的记述有点割切中理，但此处并没有一条以劳山为源头的弱水。

弱水之名记载甚多，凡水浅或因当地人不谙舟楫的河流，古人往往认为水弱而不能胜舟，故称之为弱水。除《山海经》外，在《禹贡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中，先后记述了五、六条不同的弱水，究竟那条是源出于阴山之北的劳山，而又流入洛河的呢？确又令人费解。即是洛河也非独一无二，一条是源出陕西洛南县汇伊水入黄河的伊洛河；另一条是源出陕西定边县汇渭河入黄河的北洛河。

郝懿行在其《山海经笺注》中，亦从阴山和弱水的地理位置对劳山进行了考索。他援引《晋书》中的一段记述并写道：“坚遣安北将军幽州刺史符洛讨代王涉（什）翼犍，翼犍战败，遁于弱水，符洛追之，退还阴山，此经上有阴山，下有弱水，当即是也。”乍眼一看，在《晋书》的这一段记载中，既有阴山，又有弱水，而且相距不远，劳山必在其间无疑。实则不然，《晋书·符坚传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坚既平凉州，又遣其安北将军、幽州刺史符洛为北讨大都督，率幽州兵十万讨代王涉（什）翼犍。又遣后将军俱难与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，西出上郡，与洛会于涉（什）翼犍庭。翼犍战败，遁于弱水。符洛逐之，势窘迫退还阴山。”代王什翼犍建都盛乐城（今呼和浩特市西南），其

疆域包括今内蒙中部和山西北端。晋丙子太元元年(公元379年)苻坚之讨伐,系从东、南、西三个方向进击,其战场应在今之山西北部和与之接壤的内蒙中部。这三支军队会师于什翼犍庭(即盛乐城),翼犍逃于弱水,后又退到阴山。此处之弱水是《资治通鉴》中所提的“循弱水西行至琢邪山”之弱水,其流域在内蒙境内,而这个阴山是内蒙阴山山脉之大青山。在这个境域内,并无流入洛河的水系,当然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中之劳山亦不会在其间。郝懿行对劳山的这一疏证,显然是错误的。

对《山海经》所载之劳山,还必须从该书的记述中进一步探求。其在劳山之后又写道:“西五十里曰罢父山,洱水出焉,而西流入洛。”据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记载,洛河之上源确有洱水,其流域在今甘肃庆阳东北部。据此,可以断定阴山、弱水和劳山应在与甘肃接壤的陕西北部,即秦时上郡、汉代雕阴县一带。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中的阴山,就是此处的雕阴山,据《元和郡县志》载,其位置在陕西甘泉县南四十县。清毕沅《山海经新校正》中,也记有自保安县(今志丹县)西流入洛河之水名为弱水。从洱水、雕阴山和弱水这三个地理实体的位置,可以断言《山海经》所载乃甘泉县以北的劳山,既不在符洛击败什翼犍之处,更非黄海之滨的海土名山。

郝懿行在其《山海经笺疏》中,不仅考订过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的劳山,而且还在另一处注疏中提到了当今青岛地区的崂山。要弄清其中原委,就必须从他对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》的一个注疏谈起。

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述:“琅邪(琊)台在渤海间,琅邪(琊)之东。其北有山,一曰在海间。”晋郭璞注曰:“今琅邪(琊)在海边,有山嵯峣特起,状如高台,此即琅邪(琊)台也。琅邪(琊)者,越王句(勾)践入霸中国之所都。”这里所记的琅琊台,即当今位于青岛市胶南县之琅琊台。为何由此而涉及劳山呢?这是因为在郝懿行的《山海经笺疏》中,对“其北有山,一曰在海

间。”作了一个笺注，其注曰：“琅琊台在今沂州府，其东北有山，盖劳山也。劳山在海间，一曰牢山。”郝懿行是清乾隆年间的进士，当然顾炎武是不可能看到这个笺注的，也就更谈不到在其《劳山考》中加以评说了。但郝懿行却通过对“在海间”的一个无名山的注解，硬把崂山拉进了《山海经》。

郝懿行是山东栖霞县人，我们不能说他对胶东一带的山川不甚了解，也许正因为有所了解，才把《山海经》中的“其北有山”，在注疏时改为“其东北有山”，这就有点失之严谨了。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，琅琊台之北有大珠山、小珠山，两山皆在海畔。如果就依郝氏之说，其东北方向还有个灵山岛，而且此岛又_在海中间，与《山海经》中所记更为相似。郝懿行在注疏时把“其北”改为“其东北”，而硬说此山就是崂山，确有点牵强附会，而某些文章中，又把郝氏这一笺注说成是《山海经》中的记载，则更是捕风捉影了。

总之，在《山海经》中只出现过一次“劳山”，即本文已考订之位于陕西省甘泉县以北的劳山。至于对琅琊台的注疏之言，决不能代替《山海经》的原文，这也是一个不容赘言的常识。故《山海经》所载之劳山，决非濒临黄海之滨的青岛地区的崂山。

于七师慈沾事不假

曾 却

据传说和考证，知于七起义后确实从栖霞的牙山去了崂山，并“入华严庵拜慈沾上人为师，”但《于七起义述略》一书的作者则提出异议。这一异议，笔者认为是不能成立的。

粗略一看，关于于七不可能师慈沾的理由，似乎是无懈可击的。认为：“于七到华严庵出家应在康熙二年或三年，此时慈沾法师已死十多年”^①，而且“这有华严庵和慈沾法师的历史记载和法派为证”^②这一结论，对不甚熟悉历史而又缺乏考证兴趣的读者，也许会举双手赞同；但是，只要稍加分析，人们便会觉出此中的若干破绽：

其一，若依作者的说法，慈沾是在（顺治八年）黄坦“继承父志，将华严庵扩建”之后不久园寂的^③，所谓“十多年”，其实至多不会超过十二年（1653——1663），有趣的是，这十二年看来不算漫长，只要成为事实，不仅排除了于七师慈沾的可能性，而且也排除了于七师临济宗支派中属“寂”，属“空”，属“照”此三代方丈的可能性，人们都认定慈沾法名“海空”，于七法名“通彻”，后者，按法派当然只能拜在“海”字后的第四代，即“普”字辈方丈为师了，这样说来，于七入华严庵之初，海、寂、空、照各代大师或者虽然健在却已经相率禅让；或者急于成佛，接踵园寂，然而，这园寂与禅让均必须以平均每三年一重复的速度进行，这同“第五代方丈善和之维持佛法”者三十至四十年，是十分悬殊的！

其二，作者虽然没有把临济宗支派传戒、举方丈的全部法规作详细交待，却确切地是把某代方丈同某代传人的称呼，有机的

联系在一起的，如慈沾之为华严庵第一代方丈，是临济宗支派第四代传人；善和之为华严庵第五代方丈，是临济宗支派第八代传人等等，但是，若依此类推下去，至少无法解释第十三代传人本乾大师，为何成了华严庵的第十一代方丈④：因为，按作者提示的规律，他本来应该是第十代方丈如下表：

法派（字）海寂照普通心园光续本……

方丈（代）1 2 3 4 5 6 7 8 9 10……

传人（代）4 5 6 7 8 9 10 11 12 13……

经反复阅读《述略》中的有关篇章之后，终于发现，作者在诸如慈沾上人系应黄宗昌之邀去了即墨；他居即墨一共三十年；享年八十四等许多方面，同流行的说法并无二致，可是在华严庵的始建时间上另辟蹊径，连带着把慈沾的全部活动推前了约二十年。

作者说：“慈沾是已经五十四岁才到准提庵的”那就是说，以作者所认定的顺治九年（1652）为慈沾园寂之年，便会得出“天启二年（1622）慈沾已经住进准提庵的论断，因而说四年后（天启六年）⑤始建华严庵亦未尝不可，但是，据《即墨县志》，知黄宗昌擢御史的时间为崇祯元年（1628），比天启六年晚二年。此前，他“官雄县令，以能调清苑”，正同魏忠贤党作斗争，焉能顾及为慈沾筑庵一事，且据青岛史学界多数同志的考证，黄宗昌只是到了崇祯十年的时候才辞官返乡，而且其隐居崂山，先是建玉蕊楼编著《崂山志》，后来才有了于那罗延窟东北兴建华严庵的动机，但“庵未成即毁于兵火。⑥因此，作者的“天启六年建华严庵”之说当不能成立。

又黄坦为慈沾写的《仙释补》中说：“那罗延窟，所称在旨诸菩萨止息处者，传世久，上人惧不修则渐而夷也，曰思所自始之鏊于此者谁也，而奉持者不能保有故址乎：吾责也，吾责也，谋之坦，鳩士集事，营殿宇，设旌阁，禅室僧寮之属次第以举，诚于劳费，故无下逮之力，此所谓修其本者哉？！此中指明的恰